

【编者按】本栏目由本刊和e线图情 (www.chinalibs.net, www.chinalibs.cn) 合办, 对图书情报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特约访谈。受访专家就特定问题的真知灼见将陆续见刊, 以飨读者。本期受访专家为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编辑出版中心主任, 二级研究馆员,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常务副主编。

难在改变, 赢在改变 ——访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初景利教授

刘锦山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00085)

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的变化, 带来社会各行业的变革, 图书馆则首当其冲。在数字化、网络化、泛在化的信息环境中, 图书馆如何重新定位自身、重塑形象, 避免走向边缘化乃至消亡, 这是学术界、教育界和实践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初景利教授以自己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的经历, 对此有自己的感悟和认识。他认为, 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 取决于很多条件, 但最根本的是适者生存。为此, 必须审时度势, 因应而变, 变被动为主动, 主动地驾驭环境, 改变传统的惯性、惰性和定势。他很认同的一句话是: 难在改变, 赢在改变。当然, 改革是痛苦的, 不改革将是更加痛苦的(马云语)。

为更好地了解初景利教授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 e线图情就有关用户服务、开放获取、图书馆发展战略、图书馆发展趋势等问题, 专程采访了初景利教授。

刘锦山: 初老师, 您好! 非常高兴您能接受e线图情的采访。请首先向读者朋友谈谈您的治学、工作历程。

初景利: 谢谢刘总和e线图情对我的关注和采访。1981年我以理科生的身份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专业。1985年大学毕业之后考入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攻读硕士学位, 师从关懿娴先生, 研究方向是图书馆管理。1988年2月研究生毕业后到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后图书情报学系)当老师, 曾担任系副主任。1998年(36岁)被评聘为教授。2000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攻读博士学位, 师从孟连生先生, 研究方向是信息资源管理。2002年1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实施知识创新试点工程, 合并了原来的教育培训部和研究发展部, 组建教育与研究发展部, 我被聘为部门主任。随后的一年半, 我一边工作, 一边做博士论文研究, 2003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2004年4-9月单位公派我去美国西东(Seton Hall)大学图书馆做访问学者。担任了4年的教育与研究发展主任后, 2006-2010年我又应聘新组建的部门——学科咨询服务部担任主任, 与学科馆员们一道开创了国内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新模式。4年之后, 2010年6月后应聘为编辑出版中心主任, 组织和管理院中心10种期刊、协调3个地区中心7种期刊的编辑出版与研究。2011年以后又先后担任企业性质的《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的主编、社长(法人代表)。2013年年底又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的常务副秘书长兼会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我从2002年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 先后培养了13名硕士。2005年后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 目前毕业的博

士生7人,在读博士生10人。2013年获得博士后合作导师资格。2011年获得“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创新服务优秀个人”,2013年1月被评为二级研究馆员,年底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先进个人”,2014年9月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第四批)。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际图联(IFLA)“信息素质”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图书馆学会用户研究与服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外文献编译出版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文献与信息标准化委员会第8分会副主任委员,被聘为华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硕士(MLIS)中心兼职教授,《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学刊》、《图书馆报》等编委。

刘锦山:初老师,从您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您的学术、工作经历相当丰富。我们了解到,您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与实践过程中,关注的问题也比较多,而用户服务是您长期以来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请您具体谈谈您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情况。

初景利:我1981年上大学以来,一直关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管理方面的研究。我学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未来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思考与评价》(东北师范大学,1985年),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对图书馆馆长管理行为及其导向的探讨》(北京大学,1988年),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在用户服务及管理方面,我比较早地关注到图书馆公共关系。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公共关系是图书馆管理的重要环节”(《黑龙江图书馆》1987年第2期),也是国内最早研究图书馆公共关系的论文。我在国内最早关注并引进SERVQUAL评价模型(《大学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5期),这种评价模型后来演变为LibQUAL评价模型,目前仍然是评价图书馆服务方面非常重要的工具,国内很多图书馆也都在使用。

我的经历比较丰富一些,当过12年的大学老师,现在还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做过科研,主持并参与多项省部级、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科协的课题;从事过学科服务、编辑出版等领域的实践工作。这样的经历有助于我把理论研究、教学、科研、实践这几个环节有

机地结合起来。到中国科学院以前及以后,我还始终比较关注图书情报学教育问题。2004年到美国半年,完成了有关美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美国研究图书馆的用户服务、科技信息的开放获取3份研究报告。但我持续关注的还是用户服务问题。在我看来,用户服务是图书馆存在的根本,图书馆能不能发挥作用从根本上取决于服务的水平 and 能力,取决于服务能不能得到用户的认可,取决于服务能不能真正产生效果。今天的图书馆已经不仅仅是建筑,不仅仅是资源集聚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图书馆的作用和功能更多地是通过服务来体现的。因此,我认为,服务的研究是很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图书馆学应该通过对服务问题的深度理论研究推动图书馆实践的创新发展。

对于服务,我很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这是一个大的命题。很多人都在谈、都在提“以用户为中心”。但如何体现以用户为中心?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在用户不大到物理的图书馆的情况之下体现以用户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惑,也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挑战。以前有个说法:千方百计地吸引读者到图书馆来。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是对的,但是现实情况中,网络设施越来越发达,移动终端即查即得,数字资源越来越丰富,而且开放程度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信息环境越好,用户可能就越不到图书馆来,这不是一个吸引不吸引的问题,而是用户本身的信息行为所决定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我们基本的理念和这些年所形成的认识叫做“服务的泛在性”,即嵌入式的图书馆服务。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就是“用户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今天的大多数用户并不在图书馆里,而是在教室、办公室、实验室、会议室、甚至野外观测台站或出差途中。如何为这些不到馆的用户做好服务,这就是今天我们需要直面的新问题。传统图书馆在用户到馆之后就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务,不到馆就无能为力了。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需要解决的是,通过技术手段和图书馆员个人的作用,把服务延伸到用户所在的地方,到用户的身边(物理的或虚拟的)去提供服务,提供到身边的个性化的服务。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基本理念就是“资源到所、服务到人,融入一线、嵌入过程”,这正是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以用户为中心既体现在服务的内容上,也体现在服务的模

式、技术和服务组织上，围绕用户需求特别是潜在需求开展服务。

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多图书馆注重的是满足用户现实的需求：用户需要一本书、一本期刊、一篇文章，图书馆就想设法去满足，这只是现实的需求（表达出来的需求）。而潜在的需求就是表面上用户可能提出需要一篇文章、一种期刊、一本书，但背后可能是一个研究课题、一个研究任务。用户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需求，很可能是这个领域最热点和前沿问题的需求。图书馆如何把用户潜在的需求加以识别、发现、挖掘出来并满足其需要，这是图书馆今天所要解决的非常现实的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特别强调嵌入式的学科服务，准确地讲是“嵌入式学科知识服务”，不是单纯地提供文献服务，也不是简单地提供信息服务，而是提供融入了人的知识和智慧、面向用户潜在需求、运用技术和工具来解决用户深层次需求的一种深度、高层次的服务。这种知识服务一定是嵌入式的才有效果。所谓嵌入式服务就是图书馆员（比如学科馆员）到用户的身边，嵌入到用户的科研过程、工作过程、工作场所、工作空间、工作流程，更好地实现信息（知识）与用户需求的结合，图书馆员与用户之间形成一种合作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传统的中介关系。在今天的用户基本不到物理的图书馆的情况下，如果图书馆员不到用户身边，那么图书馆和用户之间的关系就会是一个死结，用户和图书馆之间的联系必然就会中断，最后死掉的可能就是图书馆。我们并不认为在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图书馆就没有作用了，也不会像国外有的人预测的那样图书馆将会消亡，关键在于图书馆能做什么。如果图书馆做到的事情能够满足当前用户的需要，特别是潜在的需求，甚至超越用户的需求（用户没有提出但图书馆已经很好地满足了），那么图书馆当然还会有所作为，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相反，如果图书馆很被动地适应需要或者仍然还在用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服务手段来满足用户常规性、浅层次的需要，比如到馆阅览、借阅、参考咨询等，那么图书馆的地位和价值必然会受到质疑，图书馆的边缘化也是毋庸置疑的。

图书馆今后能不能发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自身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今天来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嵌入式学科服务的能力。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有大的发展、突破、根本性的变革，图书馆仍然会彰显其地位和贡献。自2006年以来，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在嵌入式学科服务上有了很好的开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客观上推动了国内学科服务的深度发展。2010年，我和部分学科馆员还共同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方法研究》，我与孙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共同来组织研究。这个课题2014年已经完成结项，修改后以书名《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与方法》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预计2015年年初出版）。我们希望通过课题的研究和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更进一步推动国内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创新。

刘锦山：初老师，您刚才讲到的以用户为中心提供嵌入式学科知识服务，非常好。现在很多图书馆也在做学科服务。我想请您再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科学院的具体做法和经验，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初景利：关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当前学科服务的做法，我没有资格讲，因为我已经脱离学科服务实践工作一线有4年多了。我虽然不再从事具体的学科服务，但我很关注，也在做一些研究，也利用主编之便，组织发表了多篇学科服务的文章。我的博士后合作指导的方向也是学科服务。我现在思考得比较多的是学科服务模式、难点与破解，试图总结我过去在做学科服务方面的经历、感受、感悟、心路历程。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学科馆员对嵌入式学科服务的认知与解析”（《图书情报研究》2012年第3期），总结了8种嵌入式学科服务的模式。随后写了一篇文章“学科服务的难点突破”（《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2年第4期），总结了学科服务五个方面的难点。后来经过更深入的思考，总结了16个难点，并做过多场报告。一些问题已经在《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这本书中有所阐述。我认为要做好学科服务，既要总结模式，又要突破难点。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做法和高校图书馆、其他类型图书馆、国外图书馆均有所不同，这可能与中国科学院特定的环境有关。中国科学院对创新的要求更高，压力也更大。中国科学院的文献情报服务如何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求，我们始终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巨大挑战和压力，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急迫感和危机感。如何保持对国家科技自主创新的适应能力，如何体现知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如何真正为科学研究、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是我们这个时

代的图书馆员肩负的一种使命和责任。

刘锦山: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初景利: 这本书把国内外, 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近些年来所开展的学科服务, 特别是嵌入式学科服务的一些认识、模式、经验、做法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其重要特点是非常强调学科服务的嵌入和服务的深度。比如, 如何跟踪科研课题, 进行科研课题的全程式信息跟踪和个性化服务, 如何更好地嵌入科研环境, 搭建一个适应科学家或课题组需要的信息环境, 等等。实践证明(也经历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探索过程), 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对嵌入式学科服务非常欢迎, 也非常信赖。因为有这种嵌入式学科服务, 所以我们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服务越好越容易得到支持, 得到的支持越多就越有能力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目前拥有60多人的专职学科馆员团队, 绝大多数均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经历, 通过“常下所、长下所”, 提供嵌入式的学科知识服务, 在全院上下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也许也代表了国内图情业界在服务方面的一种新模式, 一种新的发展方向。我们也通过切身的感受认识到学科服务的重要价值和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图书馆来讲, 如果不做学科服务、不做嵌入式学科服务、不做嵌入式学科知识服务, 图书馆就很难有更好的未来。这不是一种服务模式与机制的问题, 而是影响到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当然, 学科服务不仅仅是学科馆员一个团队、一个部门的事情, 学科服务并不等于学科馆员的服务, 而是影响到全馆、需要全馆参与的服务, 包括资源、技术等整体管理与相互配合和支持, 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服务。因此,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 学科服务就像是部队的前线。前线是与敌人打仗的地方, 全军上下都要为前线保驾护航, 图书馆也一样。看似只是几个学科馆员到用户身边去做服务(是前线, 是一线), 实际上背后是全馆各个部门、各个团队的支持。学科服务做得好坏取决于很多因素。国内有不少图书馆做得非常不错, 各有自己的模式和特点。总的来讲, 共同特点就是如何围绕着今天用户新的需求, 为用户的科研、教学提供全过程、更直接、更有深度的信息和知识服务作为保障和支撑。我们应该将嵌入式学科知识服务作为图书馆服务的一个突破口, 藉此真正带动和推动图书馆的

整体发展。

刘锦山: 初老师, 您讲到学科服务的难点需要攻破, 请您谈谈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初景利: 学科服务最大的难点在于学科服务基本理念上要有突破。学科服务不是去做资源、服务的宣传推广。以前人们认为学科服务就是做联络, 图书馆有什么新的资源就去告诉读者, 就去做培训和报告, 用户有什么需求再反馈给图书馆, 提供给资源部门或服务部门加以解决, 这是远远不够的。图书馆学科服务不是去做中介! 要从简单的宣传推广转变为嵌入式的合作, 要和用户结成联盟, 馆员应该成为用户科研团队的成员。多年以来, 传统上图书馆员一直都是中介, 是中间人的身份, 但仅仅是中间人的身份无法满足今天的用户需要。真正的学科馆员要发挥潜力、能力、作用, 就必须成为科研的合作伙伴, 成为课题组的成员。我们曾经参与过用户的863、973项目, 用户希望学科馆员介入进来对整个课题进行全程式的信息跟踪。学科馆员进入课题组, 课题组花费很小, 但收获很大, 效率更高。学科馆员是专职的情报人员, 对于资源、服务和工具都很熟悉, 如果能与用户的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 所发挥的作用是用自身所不可替代的, 当然这也是最难的。对于用户来讲, 对学科馆员的认知、接纳、信任, 一开始时困难非常大。对学科馆员来讲, 突破障碍, 真正走进科研过程、走进用户之中, 完成“破冰之旅”, 是其必然面临的一次巨大的考验。从我们馆的实践来讲, 好的学科馆员是可以做到的, 但也不是所有的学科馆员都做得到位, 但这一定是一个方向, 而且只要有一个人做得到, 就会有更多的人也能做得到。学科馆员服务也还有许多其他的难点, 比如学科服务模式、工具的利用、团队与能力建设、考核评价等, 也有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 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当然, 每个图书馆的情况不同, 难点也不同。图书馆员要善于发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来推动问题的解决。

刘锦山: 初老师, 开放获取运动从十多年前兴起, 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与商业出版模式相抗衡的重要学术文献出版与信息获取方式, 对于学术交流意义甚大。据我们了解, 您是国内较早关注开放获取的学者之一, 请您谈谈您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情况。

初景利：我是2004年到美国访学时开始关注开放获取这一问题的。开放获取是国外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交流方式。2004年出国之前，我对开放获取并不了解，国内也没有这个概念。在美期间，我对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122个成员馆的网站做了系统调研，发现很多图书馆都在关注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system (open access)。我当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开放使用：一种新的学术交流模式》，发表在当时我担任常务副主编的《图书情报工作动态》2004年第8期上，这也是国内最早关注开放获取问题的文章之一。回国以后我还专门写了一份关于开放获取的调研报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也在2005年组织了一次“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政策与机制”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当时还牵头我们中心设立的关于开放获取研究的课题“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运行模式与政策机制研究”，同时指导研究生开展开放获取领域的学位论文及相关研究，发表了多篇关于开放获取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获取是对抗商业性学术期刊出版的一种新模式。近些年，商业出版的学术期刊价格越来越高，很多图书馆无力支付越来越沉重的采购费用，科研人员也就无法阅读了解关于相关领域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这就带来学术期刊的危机、信息交流的危机、学术传播系统的危机。

开放获取不仅仅影响的是学术期刊，也对图书馆诸多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包括对资源建设、采购模式、服务能力等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开放获取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刻的。就期刊出版而言，开放获取是一种新的出版模式，打破了原来的基于订购的出版发行模式。其运营费用完全由作者或其他经费支持，但对读者则是完全免费的，打破了影响学术交流的障碍，用户（读者）可以自由、免费、没有障碍地获取研究成果的全文，其目的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科研成果大都是国家经费来支持的，是纳税人的钱，成果出来以后如何使其意义和价值最大化、社会利益最大化，这是开放获取的核心。中国科学院也在积极推动相关部委制订开放获取政策，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4年5月9日和5月15日相继发布了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中国科学院关于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后续还将出台不断完善具体政策的相关措施。这样一种政策将对我国的开放获取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必然对图书馆的业务体系、岗位设置、业务能力产生

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刘锦山：商业出版向用户收取订购费用来作为期刊的运营资金，开放获取不向终端读者收取费用，出版以后可以按照一定的许可供学术研究免费使用。开放获取实际上是把出版费用问题在前端解决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从前端收取费用，或者找一些机构赞助、资助出版，或者向作者收取出版费用，一个版面多少钱，有的期刊都是这么做的。如果对于现在协作比较密切的工业化大科研来讲，从国家或者社会拿到了科研经费，经费中间会有一部分出版费用，这样出版问题不大；但是个体的科研工作者，没有团队就自己，尤其人文社科领域经常是自己去做研究，或者不在体制内的科研工作者，没有课题和基金的资助，这部分作者的出版会受到影响，因为没有钱。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考虑过呢？以前都是读者出钱，现在都是作者出钱。通过前端收费，会不会影响到条件不太好的人学术出版的权利，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初景利：开放获取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不少人一般都简单化理解为“作者付费、读者免费”的模式，但实际模式要复杂的多。开放获取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是政策问题。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机构，如何认识开放获取，能不能作为国家或者机构的政策来加以推动，这种政策性对开放获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国际上开放获取发展比较好、比较快的国家和机构都是因为有了相应的政策来支持，为开放获取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我国目前正在通过政策推动也是基于这种考虑。二是经费问题，开放获取并不是没有成本，一定需要经费才能运转起来。专家审稿、人力成本、文章处理等等都是需要费用的，费用主要的渠道是来源于作者，因为作者本身是有项目、经费支持的，很少有完全没有经费支持、自由探索的情况。社会科学可能自由探索的情况比较多一些。就开放获取本身而言，除了作者支付的费用之外，国际上还有各种基金会来支持，基金会支持期刊发表文章免除版面费和APC（文章处理费）。另外有一些期刊本身依托的机构足够强大，可能也不需要收取版面费来维持发展。还有的情况是图书馆支持开放获取，典型的例子就是高能物理领域期刊群（SCOAP3），全世界有高能物理领域研究的机构共

同来负担这笔费用,对作者来讲也不需要负担文章发表的费用。还有一些情况是减免费用。例如中国科学院和BMC签署协议,即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在BMC期刊上发表文章自己只需要付一半的费用,另一半费用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来支付,至少对作者来讲不需要负担那么多了。还有一些国际学协会的期刊本身就是不收费的。这种开放获取期刊的情况比较多,形式也比较多样,对于作者来讲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不完全是没有经费就没有发表的机会。

刘锦山: 现在国内开放获取的刊物越来越多,全文放在网上供大家浏览、下载,从图书情报领域来讲,不少期刊每期都是可以看到的。中国科学院的期刊很多,图书情报类的刊物都在您这边。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对开放获取有什么考虑呢?

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目前主管、主办、承办的科技期刊共338种,其中学术期刊274种,英文期刊78种,绝大多数都在走向开放获取。《图书情报工作》是选择性即时开放获取,我们还要靠刊物的发行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全部开放获取很可能就没有人再订购了,那杂志社就无法生存。但是我们也在推动、适应开放获取的需要。《图书情报工作》现在采取的是重点栏目、重点文章实行开放获取,通过网站可以第一时间阅读或下载重要的文章,大约占1/3左右。《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则实行完全、即时的开放获取。我觉得国内的期刊界对开放获取的理解还有一些偏差,或者说认识上还有局限性。现在很多人、很多期刊把免费获取视为开放获取,免费获取就是在网上可以免费看到全文,实际上国内很多的期刊实行的是免费获取,而不是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和免费获取的不同在于:其一,开放获取更强调开放获取政策,开放获取需要有政策上的支持,大多数期刊基本上缺乏这样的政策。2012年10月,《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在苏州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发布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开放获取出版苏州宣言》,提出了十点建议。《图书情报工作》在2012年11月30日发布了一份“《图书情报工作》开放获取出版的政策声明”,就是规范开放获取出版行为。其二,相关的许可制度。文章允许利用到什么程度,需要一系列相应的许可制度作为保障。比如,论文下载出售是否允许,论文制成文集是否允许,或者对文章进行了一些改造、衍生是否允许,都需要有相应的许可制度和规定。这是

国内很多所谓开放获取的期刊所没有的。其三,能不能长期保存,今天开放获取了可以在网上看见全文,如果2018年网站上没有了就不能认为是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必须是可靠的长期保存,在网上获取应该是永久性的获取。此外,是立即的开放获取(发行之时同步在网上开放),还是延时的开放获取(过3个月、半年、1年、2年)?是否允许文章作者把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存储到机构知识库中(自存储)、甚至是个人的网站、主页、博客上等等,都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措施等相配套。瑞典伦德大学管理的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OAJ)就非常严格。如果入选该目录,就要遵循一系列相关政策和要求,比如说开放获取的网址是什么,是不是可以看到全文,开放获取的许可制度是什么,相应的一些规定都是开放获取所要求的。现在很多期刊都号称是开放获取,实际上都是免费获取,离完整意义上的开放获取还是有距离的。当然,毕竟免费获取是开放获取的一个基础,我们能够走出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今后还是要采取相关的制度、政策,更好地设计、引导。

刘锦山: 初老师,开放获取运动对图书馆有哪些影响?图书馆应当如何面对开放获取运动的影响?

初景利: 我目前并不具体参与图书馆的业务,我从一个研究者和旁观者的角度来谈谈我的看法。图书馆要敏锐地认识到开放获取所带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图书馆可能产生的颠覆性影响,要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传统图书馆业务模式可能会在数字化、网络化、开放获取形势之下难以为继。原来的资源都是订购型的,现在开放获取的资源会越来越多。国外有人估计开放获取的文章目前已经达到了30-50%,未来若干年可能会达到70-80%。这样,图书馆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员去花钱买资源。如果是这样,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应该做些什么?传统图书馆通常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购买资源,也许5年以后图书馆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买资源了。图书馆作为购买者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以前需要很多人、时间、精力去从事资源建设,但是在数字化、开放获取时代,资源建设主体是购买数据库,而且相当数量的图书、期刊、研究报告、课件等等也都在走向开放获取,不需要花钱去购买了。我们设想一下,5年以后当图书馆不需要花钱去买资源的时候,而且所获取的资源都是数字化资源,图书馆还做什么?我们必须及早认识这个问题,及早去适应这个转变,这个转变就

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服务驱动，把我们关注的重点从购买资源转向服务，转向深度的知识服务。这是图书馆今后发展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保持应有的地位，甚至能不能生存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图书馆必须要转型。以前和资源打交道，围绕资源去做很多业务工作，将来必须要围绕人（用户）去打交道，围绕着用户的需求去采集资源、组织资源，更好地提供服务。这对图书馆来讲是战略性转变，能不能转变得好，意义重大。开放获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采购模式的变化，而且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重新设计，也是对图书馆服务能力的重新构建，更进一步可能也是对图书馆本身性质、功能的重新认识。

刘锦山：现在国内外的开放获取平台有好几个，据我了解都是把期刊的地址作一个链接放上去，可以浏览、可以下载，但使用的便捷性还是相对弱一点，像全文检索、统一检索功能都没有。将来开放获取的期刊和图书越来越多，大家可能把各自的东西放上去或者每个出版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站，现在的数据库都是商家通过拿到授权整合以后再销售给图书馆，将来可能80%以上的期刊都开放获取了，图书馆可以自己获得这些资源，但是图书馆是不是还得需要整合后的东西？因为散布在很多期刊网站上的开放资源，图书馆使用是不是不太方便？这已经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国外的很多数据库商本身就是出版商，其出版物开放获取以后自己是有版权的，国内的数据库商不是出版机构，没有版权，而把期刊版权谈来再自己整合，将来如果期刊都放到网上去了，这些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不仅是图书馆的模式、内涵会受到开放获取运动的影响，可能商业机构也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图书馆或者其他机构去做整合服务，如中国科学院也有不少刊物在期刊的主页放着，这样对读者来讲显然也是不太方便的。

初景利：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新的问题。现在国内外开放获取的方式有三种：第一、期刊网站，自己的期刊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全文的阅读和下载的方式；第二、商业性的出版机构，不少都在提供开放获取，这也是能够提高数据库影响力的很重要的方式，从原来的抵制到现在积极参与，认识到开放获取的潮流，也在积极地利用；第三、第三方建立的基础平台，像科学出版社（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建立的“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http://www.oaj.cas.cn/>），希望把国内开放获取的科技期刊整合在一起，形成检索利用。现在开放获取的资源是非常分布式、发散的，这也带来了如何去更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问题。图书馆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做开放资源的登记系统，把包括期刊、会议在内的各种各样开放获取的资源收集起来，做成一个平台系统以后更好地揭示和利用。对其他关注开放获取的机构而言，如何把资源更好地收集、揭示也是今后需要去解决的重要问题。图书馆将来重点工作不用再做采购的时候，资源的组织、揭示、知识的发现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资源建设工作的核心必然要转向资源、知识的组织，通过本体等的组织系统，对知识进行更好地组织、揭示、分析，建立发现系统和导航系统，这可能是今后着重要加强的工作。开放获取的资源越丰富，这方面的任务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图书馆和用户而言，能获取的资源越丰富，对服务就越有利。如何把广泛分布的资源有效、及时的获取，转化为服务能力，这是图书馆今后要重点开展的工作。

刘锦山：初老师，战略对于一个组织的发展至为重要，国外的图书馆对于战略规划都非常重视。而国内的图书馆最近几年也开始逐步重视起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您对于图书馆发展战略也一直关注有加。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初景利：图书馆发展战略关系到图书馆的未来。图书馆不仅仅要关注现在做什么、过去做什么，更要关注今后做什么，今后的3年、5年、10年做什么。尽管战略研究带有预测性质，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和可靠，但是没有预见，就不知道未来发展的方向。要通过战略研究更好地规划今后发展的路线，动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战略问题非常重要，不像分类、编目、资源建设，这不是一个具体的业务问题，而是影响整个图书馆发展的全局、重大的方向性问题。如果方向错误，付出再多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与企业相比，国内图书馆界不大关注战略，据我所知很多图书馆包括一些很知名的大学图书馆，都没有发展战略，没有“十二五”规划，也没有着手制订“十三五”规划。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面向“十三五”制订发展战略的关键之年。《图书情报工作》2015年的第一个选题就是面向“十三五”

的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年度课题指南》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第二个选题也是关于战略的——2020年图书馆国家或区域战略与规划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更加正视图书馆发展战略问题。战略的问题并不是务虚,它是一个实实在在规划我们行动的纲领。今后的发展到底要做什么,2016年做什么、2017年做什么,总不能2020年做的事情和2015年一样的。要想做得到,必须先想得到,只有想得到才能做得到。

图书馆应该对于发展战略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共识,形成未来发展的方向,形成未来发展的规划蓝图。2014年11月,全国高校图工委在海南召开了高校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我做了一个报告谈我对这些方面的认识。我对国外图书馆的发展战略规划也做过一些调研,看过一些国外的研究报告和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国际上对图书馆发展战略的规划问题非常重视,国内图书馆界因为种种原因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和实践都还比较薄弱。我这些年做的国内学术交流讲比较多的也是图书馆发展的趋势与战略问题,这可能和我担任《图书情报工作》主编也有关系。作为一个学术期刊的主编,我必须很好地把握我们这个领域、学科、专业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当然我想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把图书馆的战略规划问题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研究,而且能够在实践上不断去推动。战略规划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成果,要落实,要有措施,要有行动计划,要有经费保障。

战略规划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要形成共识,要让全馆的人、业内的同行,更多地了解图书馆今后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图书馆将来到底会怎么样,朝哪个方向去发展,并为此积极地谋划和组织实施,这是很重大的课题。业界不少人在图书馆未来发展战略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和消极的情绪。要通过规划和研究来分析发展形势,明辨发展的方向。第二个意义是要通过规划和研究为图书馆争取到应有的支持。因为图书馆发展要有保障措施和条件。要实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去实现,需要通过与上级有关部门的沟通,来最后对这些规划达成共识,取得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包括人员、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为图书馆更好地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规划,就很难得到这种支持。作为一个图书馆馆长如果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发展,不知道2016年该做什么,不知道2020年应该做什么,那这个图书馆的发展一定是盲目的,而且不可能

有很好的发展,这样的馆长也是不称职的。如果馆长只会向学校(上级)要求增加经费,凭什么要增加呢?必须要有一个可行的方案,才会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同,才有可能得到经费的支持。我前几天见到一个大学主管图书馆的副校长,同时主管财务,他说以前很多人都以为学校没有钱,其实学校是有钱的,但是钱用在哪个方面就要看哪个方面更重要。如果图书馆有很好的规划,知道今后怎么发展,而且这样的发展能够征服领导,领导觉得这个规划确实很重要,能够对学校的教学科研产生非常大的帮助,就会把经费优先重点投向图书馆。如果什么想法都没有,只会按部就班地借书还书,还是在维持传统的图书馆业务,仅仅维持开馆的水平,那自然就得不到这种支持。因此,战略规划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规划的制订,能够形成未来发展的很好的行动方案,得到学校的支持。作为一个研究图书馆来讲,最重要的是考量为学术机构(大学、科研院所)的教学和科研能否提供有效的信息保障和情报支撑,而不仅仅是提供阅览的场所、学习的空间,因为这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面向“十三五”对图书馆来讲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我们总在说机遇,“十三五”对图书馆而言确实是一个机遇。如果我们在这五年内能够抓住机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在资源保障、技术应用、特别是在服务能力方面有一个快速的提升,图书馆今后的发展可能就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否则在这五年我们仍然还是非常被动,仍然还是在固守传统,没有大的创新发展,包括在学科服务能力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可能就失去了机会,再去发展难度就会非常大,图书馆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真的很难讲。

我希望通过各种场合去宣传推广这个思想,重视战略规划,重视发展方向的研究和整个业务能力的重新部署。《图书情报工作》每年搞一次新型图书馆员能力提升培训班,主要考虑在新的环境和需求之下,图书馆员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适应今天图书馆发展的需要,适应图书馆未来发展的需要。每年培训的主题、内容和邀请的专家都有不同,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培训能够为国内图书馆员能力提升方面有所推动。与此相关,我在海洋出版社也在组织专家策划出版了一套《新型图书情报人员能力提升培训丛书》,现在已经开始陆续出版了。希望通过这些工作,帮助图书馆员面对未来的变化,衔接目前的发展和未来的需求,更好地适应图书情报转型的需要。这些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转型”:从传统的图书馆转向新型的图

书馆。原来的图书馆主要是资源依赖的发展方式,以后要转型为服务驱动的发展模式,这是转型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

刘锦山: 初老师,说到战略就要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因为战略肯定有共性的问题,虽然每个图书馆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制订各自的战略,而共性的问题就属于图书馆发展趋势问题。请您谈谈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初景利: 关于图书馆发展趋势还是一个比较难于说得 clearer 的话题,这可能一个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图书馆的类型、本人对于相关问题的认知都是有差别的,对图书馆未来发展的趋势的认识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

我认为下面几个方面是图书馆比较重要的发展趋势:

第一,从注重文献保障走向服务能力提升。传统图书馆有钱就去买资源,资源越多越好,资源越多图书馆的能力越强。实际上这不是绝对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数字资源占主导的时代,资源的保障并不是最困难的问题,因为总是可以通过购买、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网上搜索引擎等很多途径获取资源。只要用户提出需求,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不应该是有了钱就全部花在资源上,再有钱也不可能实现资源100%的保障,能达到90%就算相当好了,能达到70%就不错了。这一点,在认识上需要转变。资源还是很重要的,是基础,但不要把我们精力、经费全部投入到资源保障上,我们的重点和重心应该转到服务能力的提升上,把对资源的保障转化为为用户提供服务的能力上,这是我们需要加大力度去做的事情。要更好地了解 and 把握用户的需求,更好地揭示和发现用户的需求,更好地围绕用户的需求来提供服务、组织服务,去设计面向当前用户需求的服务体系。将来想到一个图书馆,不是想到这个馆拥有多么丰富的资源,而是图书馆能给用户什么样的服务。比如,图书馆和医院比较,医院不是宣扬自己拥有多少仪器、场地有多大、大楼有多漂亮,而是有多少有名的医生、能够在治疗哪些疾病上有专长。图书馆需要做到的是提升服务的能力,人们想到图书馆时是想到图书馆拥有什么样的学科专家,能够解决用户什么样的问题,能够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特别希望若干年之后图书馆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科情报专家,当用

户需要图书馆的时候,能够想到图书馆的专家,能够求助于专家解决问题。图书馆的影响力来自学科情报专家的影响力。

第二,从印本资源转向数字资源。图书馆利用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服务,而今天的用户特别是科技用户基本上不看印本,而是通过网络来阅读数字资源,所以数字资源对用户来讲更为重要。国外的图书馆已经把很多经费投入到电子资源上,有的图书馆在电子资源的投入比例是相当高的。而国内的图书馆基本处在50-60%的水平上。实际上对于图书馆而言,有了电子资源才能更好地去适应用户在桌面及时、方便获取信息的需要。用户不希望去查看印本是因为过于费时费力。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上也必须适应这样的转变。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出版市场的变化。出版商在出版政策方面已经并且将继续做出调整,原来主要出纸版,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在转向电子、数字化。数字化资源的成本更低,而且传播的速度更快、更广。原来我们说印本优先(p-first),现在出版的战略是电子优先(e-priority),甚至有一些电子期刊完全是电子的(e-only),而不出版纸版。当出版市场越来越多都是数字化的,甚至是纯数字化的,图书馆还在纠结于购买印本,就必然失去市场的基础。市场的变化对图书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作为图书馆工作者也要去关注出版领域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对资源采购的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第三,从图书馆员转变为情报专家。以前说图书馆员的工作就是借借还还,很多人对图书馆员的认识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这可能是物理图书馆时代图书馆员比较典型的形象。在数字化、网络化、知识服务的时代,图书馆员本身的学历、知识、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拥有学科背景高学历的图书馆员,完全有可能成为学科的情报专家。这种学科情报专家要能够深入到研究课题之中,能够成为课题研究的顾问、情报分析专家,能够对研究的课题提出分析,比如研究的热点或前沿、竞争力比较、国外其他机构的研究动态和战略等,深入到课题的研究过程之中,真正解决课题研究中信息支撑的问题。

第四,从到馆服务走向泛在服务。所谓到馆服务就是用户到图书馆接受图书馆员所提供的服务,这个工作还是要有的,毕竟还是有用户特别是本科生愿意到图书馆去享受图书馆的环境和服务。他们到馆的话,我们还是要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国内外有很多图书馆在提

供学习共享空间、信息共享空间，就是为到馆的读者创造良好的环境，但这还是不够的。如何引导图书馆员走出图书馆的围墙，走向用户的空间，实现融入和嵌入，与科研过程更好地结合，这是今后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研究生、老师、科研人员、领导是不到图书馆中去的。如何把服务的前线推向用户的身边，这是今后图书馆要解决的问题。图书馆员的职业定位不是在图书馆里工作，而更多的是在用户的空间中，包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与用户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第五，从手工转向工具。现在所谓的智慧图书馆、智能图书馆等等，都是在强调技术、工具在图书馆中的应用，能够用计算机、技术系统解决问题就不要用人工。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说过一句话，“图书馆能力的大小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智慧”。将来的图书馆不是馆藏规模大、馆员人数多就是一个大的、有能力的图书馆，而在于能不能很好地解决用户的问题。如何加强工具的利用、工具的研发来解决、替代馆员的手工劳动，从而更有效率地开展服务，更加体现服务的深度。如果没有工具，很多分析完全靠手工是做不到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工具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这方面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更大的服务空间。

第六，更加重视馆员能力培养和提高。我们以前比

较重视物质，有了钱就买资源、买设备或者建立一个馆舍，今后应该把对人（馆员）的培养、使用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图书馆的未来取决于图书馆员的能力，就像医院的能力是由医生的水平所决定的。只有把馆员培养成知名的学科情报专家，图书馆才会有显示度，有影响力，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培养馆员成为学科情报专家，这是今后应该着力推动解决的首要问题。如果一个图书馆能够有一批学科情报专家，更好地去支撑一个机构的科研教学、发展战略规划，图书馆就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中国科学院一些院所的科技战略规划都有我们的情报人员参与。为什么情报人员能够起到这个作用？是因为情报人员本身具备学科基础，视野更宽阔，接触的信息更多，并且更具中立性。不是说科学家有偏见，但科学家总有其学科背景、自己学科领域的局限，甚至不排除有利益的相关性，规划的课题可能是其所擅长的，他可能在这方面积聚优势。而情报人员没有这方面的倾向性，完全以客观、中立的角色参与到规划的研究和制订之中。因此，图书情报人员在今后的科技规划发展方面会发挥更好的作用。馆员能力的提升将决定图书馆的根本出路。培养高水平的图书情报专家，真正起到专家的作用，为用户提供咨询、指导并参与规划和研究，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作者简介

刘锦山，男，1969年生，博士，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E-mail: ljs@leisun.net。

（收稿日期：2015-01-05）
编辑：雷雪